

高等院校产业经济史教程

中国 现代产业经济史

Industrial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49.10—2009

汪海波 ● 等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高等院校产业经济史教程

中国 现代产业经济史

Industrial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49.10—2009

汪海波 ● 等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汪海波等著. —太原:山西
经济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 - 7 - 80767 - 317 - 0

I. ①中… II. ①汪… III. ①产业 - 经济史 - 中国 -
现代 IV. ①F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2643 号

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 (1949. 10 - 2009)

著 者: 汪海波 等
责任编辑: 李慧平
助理责编: 解荣慧 李春梅
装帧设计: 赵 娜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社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4922133 (发行中心)
0351 - 4922085 (综合办)
E - mail: sxjfx@163.com
jingishb@sxskcb.com
网 址: www.sxjcb.com

发 行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6
字 数: 807 千字
印 数: 1 - 3000 册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67 - 317 - 0
定 价: 60.00 元

第一版 序

关于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问题^{*}

一、撰写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的起因

从 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我国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社会科学研究也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各种新中国国民经济史和部门经济史的频频问世,就能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点。

但是,迄今未见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的著作出版。部门经济史固然不能涵盖全部第一、二、三次产业,就是国民经济史也没有包括整个第三产业。显然,这种情况不利于对新中国产业经济发展经验的全面总结,不利于作为经济学基础学科的产业经济史学的建立,不利于为决策部门提供更全面的参考,不利于充分满足教学的需要。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书拟在这方面做些探索。

二、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的研究任务

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的研究任务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运用现代经济学关于产业经济的理论,探索和叙述中国现代产业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哲学揭示了人类社会、自然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必须结合实际,并且必须结合实践加以发展,否则,不仅不可能成为实践的指导思想,而且会成为贻害实践的僵化教条。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就意味着要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因为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有分析地运用现代经济学。三次产业的理论是从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著名代表是英国学者科林·克拉克。他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于 1940 年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把产业结构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主要是农

^{*} 《中国产业经济史》(1949.10-2004)第一版序对第二版基本适用,且有必要保留。所以,除了少数几处修改外,基本内容都保留下来。

业,还包括畜牧业、游牧业、狩猎、渔业、林业。第二部门是制造业。对矿业的划分不明确,有时被划为制造业,而有时又被划为第一部门。第三部门为其他各业,称为服务业。包括建筑业、运输业、通讯、商业、金融、教育、卫生、文学艺术、科学、行政和国防以及个人服务。他认为,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因而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状况是,第一产业减少,第二和第三产业逐步增加。可以认为,这个理论大体上反映了人类社会产业发展的规律,值得借鉴。但克拉克理论只是揭示了产业经济理论的基础性内容,并不是全部内容。在他以后,这方面的理论还有很大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分析地运用现代经济学关于产业经济的理论,是研究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产业经济涉及的内容。首先,本书对三次产业的划分,是依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 5 月关于这个问题的规定,即: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是指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在上述三次产业划分基础上,本书对产业经济发展过程的叙述,都程度不同地涉及支配和影响产业运行的宏观体制、微观机制和产业政策,产业经济总量运行方式、速度和形态,产业总体结构(第一、二、三产业构成)、部门结构(第一、二、三产业内部结构)、产业组织和企业规模结构、地区结构和技术结构以及产业经济运行的结果(包括对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的影响)等方面。

叙述产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发展规律。同其他科学一样,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的任务也在于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从史学研究的视角考察,要揭示历史规律,主要的基础性工作是要如实地叙述历史过程的原貌。但也需要客观的、画龙点睛的分析小结。这也是揭示历史规律不可忽视并且不能由叙述历史过程所代替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研究方法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这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要求。这样,从史实出发,就成为产业经济史研究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如果不从史实出发,而从原则(比如党和政府某些政策)出发,就不可能完成它的使命。

但是,这里所说的史实,必须是经过批判地审查过的、去伪存真的,而不是虚实混杂的;是“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而不是“片断的和随便捡出来的”;^①是反映客观规律要求的大量事实,而不是个别的偶然现象;是表现本质的典型事实,而不是歪曲本质的假象。

^①《列宁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279 页。

这里所说的史实,是历史过程中的事实。用历史事实叙述这个过程,是包括产业经济史在内的所有史学著作在叙述形式上所必须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同经济学对问题的分析采取摆脱了具体历史形式的抽象论点是有重大区别的。

就产业经济史中的重大事件来说,这个历史过程包括决策过程、实施过程和实施结果三方面。

在叙述这些历史过程时,势必涉及决策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人物。这样,对重要人物在这些过程中作用的叙述,就成为产业经济史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

与叙述历史过程的特点相联系,产业经济史这门学科在篇章排列顺序上也有它的特点。马克思在论到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经济范畴排列次序以及与此直接相联系的分篇时曾经指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①与此不同,产业经济史的研究则必须按照历史发展阶段的先后顺序来分篇。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产业经济史的研究可以不采用逻辑的方法。事实上,经济史对某个历史阶段内各方面经济问题进行分析时,也有一个诸方面先后次序的排列问题。而这诸方面由于均处于同一个历史阶段,就没有历史发展的先后次序之分;对这诸方面先后次序的安排,就不可能采取历史的方法,而只能依据它们在社会经济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经济史对某个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所提出的各种论点的先后次序的排列,也存在这种情况。但是,经济史在这两方面采用的逻辑方法,与政治经济学仍然不同。后者可以采取抽象的论点形式,而经济史则必须通过历史事实来阐述。就这方面说,可以称为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结合。

第二,坚持生产力标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如果产业经济史的研究不坚持这个标准,而采用别的标准(比如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某些言论),那么,产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就不可能得到科学说明。

第三,注重党和政府在产业经济发展方面的领导作用。由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以及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都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的情况下,由我国国情决定的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是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一般的、现代的、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而是特殊的、有国家更多干预的市场经济。当然,这种干预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市场是社会生产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因此,如果脱离了党和政府的领导作用,那么,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发展过程(包括顺利发展过程和遭受严重挫折过程),是不可能得到说明的。正因为这样,本书每篇在叙述新中国各个时期产业经济发展过程时,都要首先叙述党和国家在这个时期提出的任务以及路线、方针和政策。这绝不是形式主义的做法,绝不是多余的,而是为了真实地再现中国现代产业发展的过程。当然,这绝不是说党和国家提出的任务以及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都是正确的,都起了积极作用。实际上,在某些时期或某些时期的某些方面是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10页。

缺陷和错误的,在不同程度上起了消极作用。这需要依据各个时期产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给予客观评价。但如果脱离了党和政府的领导作用,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发展的进程是无法得到说明的。^①

第四,注重产业经济发展历史过程中数量的关系。历史过程像一切事物一样,都是质和量的统一。因此,如果只注意历史过程质的方面,忽视量的方面,就不可能全面反映历史过程。这个问题在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的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本书除了在正文中引用了大量的数据以外,还附了37张有关产业经济全局的、系统的(其中很多都是分析性的)表格。这样做,除了可以弥补正文分析的不足以外,还有助于精简行文,特别是有利于一目了然地观察事物的全貌。^②

四、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的分期

基于各有关问题的重要性的差别,我们在本书中以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变化作为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分期的主要标准,并以正标题表示;在许多时期以社会生产力的变化状况作为第二位标准,并以副标题表示;在个别时期还以政治因素作为次要标准,也以副标题表示。这样,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的分期就是:

第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产业经济

——经济恢复时期的产业经济(1949年10月~1952年);

第二,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产业经济

——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建立时期的产业经济(1953~1957年);

第三,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产业经济(一)

——“大跃进”阶段的产业经济(1958~1960年);

第四,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产业经济(二)

——经济调整阶段的产业经济(1961~1965年);

第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产业经济(三)

——“文化大革命”阶段的产业经济(1966~1976年9月);

第六,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产业经济(四)

——经济恢复与“洋跃进”阶段的产业经济(1976年10月~1978年)

第七,市场取向改革起步阶段的产业经济

——以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战略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产业经济(一)(1979~1984年);

^① 这里需要提到:英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主编费正清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该书的《序》中指出:“与帝国时代和民国时代不同,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生活的任何方面,国家的任何地区都不能不受到中央政府使中国革命化的坚定努力的影响。要考察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而不考察共产党变革它的努力的来龙去脉,则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人们就必然要从北京的党的政治局和政府的国务院的角度着手观察中国。”[英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如果把这段文字中的“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换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那么,它的基本精神都是可以同意的。可见,尽管这两位史学家和我们的世界观根本不同,但在研究中国社会生活各方面(当然包括产业经济)时必须研究党和政府的作用这一点上,同我们看法是一致的。

^② 为了节省篇幅,本书第二版将37张表格全部删去。但有关经济全局的数字,都扼要地保留在全书的各部分。

第八,市场取向改革全面展开阶段的产业经济

——以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战略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产业经济(二)(1985~1992年);

第九,市场取向改革制度初步建立阶段的产业经济

——以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战略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产业经济(三)(1993~2000年)。

第十,市场取向改革制度完善阶段的产业经济

——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战略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产业经济(四)(2001~2009年)

但上述分析只是说明了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分期的一般依据,即从总的方面说明了这种划分的首要标准和第二位标准,并未说明各个时期提法的具体根据。这一点正是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如果再考虑到各个时期的提法在学术界有争议,以及个别时期的特殊因素需要进一步说明,那么逐个地简要地分析各个时期的提法就显得更为必要了。

依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著作,以及实际经济发展状况,作者将第一、第二个时期确定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①这是从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来说的。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看,第一个时期是经济恢复时期,第二个时期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建立时期。这是很明显的。

我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伴随官僚资本的没收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农业和个体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逐步全面建立起来的。一直到1978年,这种体制不仅没有得到根本改革,而且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还被进一步强化。但从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和政治因素来看,这个时期却经历了各有特点四个阶段,即“大跃进”、经济调整、“文化大革命”以及经济恢复与“洋跃进”。所以,从前一角度将这个时期划分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一)、(二)、(三)、(四);从后一角度将这个时期划分为“大跃进”、经济调整、“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经济恢复与“洋跃进”4个发展阶段。

从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即开始步入了市场取向(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依据改革的进程,将其划分为4个阶段:市场取向改革的起步阶段(1979~1984年),市场取向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1985~1992年),市场取向改革制度初步建立阶段(1993~2000年)和市场取向改革制度完善阶段(2001~2009年)。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就是要实现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第一步,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基本解决人民生活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在21世纪中叶使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使人民过上中等富裕生活。^②但鉴于1995年比原定计划提前5年实现了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中共中央和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原定的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提高

^① 详见汪海波:《“新民主主义论”研究(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经济研究》,1993年,第12期。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251页。

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①后来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又进一步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部署具体分为两个阶段: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②在前面对第七、第八、第九、第十时期所作的划分,其依据就在这里。

以上就具体划分10个时期的依据分别做了分析。这里还拟就其中某些时期的起点和终点做一些说明:①当前一般说法都把1963~1965年称作经济调整时期。但是,我国经济调整实际上从1961年就开始了。所以,把1961~1965年称作经济调整时期。②市场取向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是以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选择1985年作为这个阶段的起点,是考虑到这个决定实际起指导作用的起始时间。③市场取向改革的制度初步建立阶段是以199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标志的。选择1993年作为这个阶段的起点,也是考虑到这个决定实际发生指导作用的起始时间。④按预定计划,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或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要到2020年才能实现。而本书的叙述只到2009年。

最后,还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本书作为简明读本,在叙述历史过程时,都很扼要;并在每编末尾列出复习的重点。第二,本书叙述范围只限于中国内地,未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汪海波

2005年3月20日

①《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②《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第二版 序

关于《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1949.10—2009)的若干说明

《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1949.10—2004)(本书第一版),只写到2004年。《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1949.10—2009)(本书第二版),写到2009年。这两版的间隔时间只有5年,并不算长。但在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上,这5年无论是在经济改革方面、经济发展方面和指导思想方面都是颇具特色的5年。在改革方面,国有垄断行业和文化事业的改革,农村经济的全面改革,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等均属此例。在发展方面,更具特色。2005~2009年这5年在这一轮经济周期中,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2005~2007年这3年继2004年之后连续偏热和过热。但这4年之间的经济增速的差距并不大,算不上大起。如果以2007年为波峰年(该年经济增速为13.0%),以2009年为波谷年(该年经济增速为8.7%,初步核算数字),那么,波谷年和波峰年之间经济增速的落差只有4.3个百分点。这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出现的第一个轻波周期(详见本书第10编第7章)。要着重指出:2008~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中国经济周期下行和世界金融危机以及自然灾害(四川汶川大地震)等多重严重冲击。但这两年经济仍然取得了平稳较快发展。这个伟大成就实属来之不易!并因此赢得了举世美誉。在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方面,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提出和阐述了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主要标志。从这些方面来说,这5年历史是值得着重叙述的。

出版本书第二版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就为从整整60年的视角叙述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提供了机遇。而这种叙述对于完整地把握新中国产业经济发展的伟大征程、光辉成就和丰富经验,探索和认识其发展规律,都有特殊重要意义。还要提到: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国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出版了大量的、系统的有关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书籍和资料。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巨、内容之丰,都是空前的。这样,本书的撰写不仅有特殊意义,而且有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本书第二版,不只是把叙述的时间向前延续了5年,更是对第一版做了大量的修改。我国学界有一句流行语说得好:文章是写出来的,也是改出来的。当然,改也是写。但这里说的改有其特殊含义,是指文章写出来以后,要反复地改。就本书来说,在出第一版之前,做过多次修改。这次第二版出版之前又反复修改。修改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

对第一版原有的一些提法(包括标题和行文等)在仔细斟酌以后做了改动。二是依据新的资料对第一版内容做了补充,特别是对其中的某些薄弱方面(如对第三产业变革和发展的叙述)做了补充。三是对第一版运用的史料做了筛选,行文也做了精练。这样,与第一版比较,虽然叙述的时间多了5年,但全书总篇幅却减少了。

本书第二版还对产业经济史的撰写方法继续做了探索。在这方面,首先是延续了第一版的基本方法。包括坚持实事求是和生产力标准,以及注重党和政府在变革发展产业经济中的作用和产业经济变革发展过程中的数量关系的叙述。还延续了与这些基本方法相联系的具体方法。诸如:以基本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变革作为历史分期的第一标准,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第二标准;以历史方法为主,并辅之以逻辑方法;大量采用具有实证特征的数量分析方法。但在这方面本书第二版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延续第一版的方法上,而是继续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这里的突出问题是:一方面,新中国成立60年产业经济变革和发展的史实甚为浩瀚;另一方面,作为单卷本的本书规模虽不算小,但也不可能容纳这样浩瀚的史实。这个矛盾在以下四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一,典型历史事件与非典型的历史事件以及重要历史事件与次要历史事件的选择。显然,如果企图把所有非典型的事件和次要事件都写进来,那不仅是写单卷本做不到,就是写多卷本也难以容纳。当然,在写单卷本的情况下,这个矛盾更难处理。所以,唯一可行的方法是选择那些典型的和重要历史事件,将那些非典型的和不重要的历史事件抽象掉。

这里要消除一个误解,似乎只有理论经济学必须运用抽象法,而经济史学则不须运用抽象法。实际上,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必须运用抽象法。二者的区别只是在于抽象的层次不同。一般说来,前者的抽象层次比后者要高得多。但不存在经济史学不需要运用抽象法的区别。事情很清楚,即使是多卷本的经济史,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地把所有历史事实都囊括进来。如果真的这样眉毛胡子一把抓,那就看不清事物真面目和问题的本质了。从一般意义上,抽象法是包括经济史学在内的任何科学揭示本质所必须采用的方法;否则就不可能达到揭示事物本质的目的。而任何科学的任务又恰恰在于揭露事物的本质。^①

因此,本书在解决这个矛盾时,力图选择那些典型的和重要的历史事件,舍弃了那些非典型的和次要事件。

第二,三方面历史过程的选择。完整地说来,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都包括决策过程、实施过程和实施结果三方面。但对一卷本的写作来说,要对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都包括这三方面也难做到,甚至不可能。这就有一个选择问题:对哪些重大事件必须做到三方面,哪些只能做到两方面,哪些甚至只能做到一方面。本书力图按照有利于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这个任务做出选择。

第三,叙述方法与分析方法的结合。以史实为出发点,并以史实叙述历史过程,是撰写史学著作的共同方法。但在这里叙述方法是离不开分析方法的。这至少有以下几重含

^①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明确说过:“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3页。)

意:一是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是以历史分期为前提的。而历史分期又是以一定理论指导下的分析为前提的。二是就历史事件的叙述过程本身来说,如果离开了对事物的梳理,势必杂乱无章,看不清眉目。三是如果要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总结出一些必要的经验教训,那就更离不开分析。所以那种认为在历史撰写中的叙述方法可以脱离分析方法的观点,很难成立。但是,史学著作毕竟不同于理论著作,它是以叙述历史过程为主的。这里也发生了叙述方法和分析方法的结合问题。本书力图按照史学撰写的任务和一卷本的规模,以叙述历史过程为主,并辅之以必要的分析。

第四,详细叙述、分析与简要叙述、分析的结合。无论是典型和重点历史事件的选择,三方面历史过程的选择,抑或叙述方法和分析方法的结合,其中都包含有一个详细展开和简要提及的问题,以及二者的结合问题。那种笼统地把详简不一看做是史学撰写的缺陷的观点,也值得商榷。当然,就全书来说,详简要大体均匀不能畸详畸简。但这绝不是说,对各个历史过程的叙述和分析,都要做到详简一致。基于前面分析过的三个原因,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能够做到的是该详则详,该简则简。实际上,无论是单卷本的史学著作,或是多卷本的史学著作,都程度不同地有(而且不可能没有)详简不一致问题。本书也是力图按照问题的重要性和全书篇幅等因素,把详细叙述和简要提及结合起来。比如,就全书来说,工业的叙述和分析比较详细,农业次之,第三产业更是如此。就改革以后的部分来说,对所有制改革的叙述和分析就详细一些,对市场体系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就简略一些。当然,这样做并不只是由于篇幅的限制,部分地也是由于掌握资料的限制。

本书在写作方法上所做的这些探索乃至全书的内容,是否正确和妥当,诚恳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汪海波

2010年3月30日

目 录

第一版序	关于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问题	1
第二版序	关于《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1949.10—2009)的若干说明	7

第一编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产业经济 ——经济恢复时期的产业经济 (1949年10~1952年)

导 言	2
第一章 建立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制度	3
第一节 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组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	3
第二节 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雏形	8
第三节 实施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建立国营企业管理制度	12
第四节 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发展	18
第二章 实行土地改革,保护和发展个体经济	20
第一节 实行土地改革,保护和发展个体农民经济	20
第二节 保护和发展个体手工业经济	23
第三章 发展合作社经济	26
第一节 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26
第二节 发展手工业合作组织	27
第三节 发展供销合作社	29
第四章 保护并有限制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30
第一节 扶植有益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30
第二节 打击投机资本和调整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31
第三节 开展“五反”运动和进一步调整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34
第四节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恢复和改组	38
第五章 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40
第一节 工业中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迅速发展	40

第二节 工业中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的初步发展	41
第三节 运输业、商业和金融业中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42
第六章 恢复产业经济的政策措施	44
第一节 恢复全部产业的政策措施	44
第二节 恢复第一产业的政策措施	49
第三节 恢复第二产业的政策措施	53
第四节 恢复第三产业的政策措施	59
第七章 经济恢复时期产业经济变革和恢复的主要成就和问题	61

第二编 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产业经济

——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建立时期的产业经济

(1953~1957年)

导 言	66
第一章 实现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67
第一节 1953~1955 年上半年,农业合作化在反冒进中稳步发展	67
第二节 1955 年夏季以后,毛泽东发动农业合作化高潮	69
第三节 农业合作化的主要成就和问题	72
第二章 实现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75
第一节 1953~1955 年,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普遍发展	75
第二节 1954 年以后,有计划地扩展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	80
第三节 1956 年初,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	83
第四节 对资本主义经济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就和问题	88
第三章 实现对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91
第一节 1953~1955 年,手工业合作化的普遍发展	91
第二节 1956 年上半年,出现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	94
第三节 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就和问题	97
第四节 个体商业的合作化	99
第四章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改进方案的提出	101
第一节 1956 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101
第二节 1957 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进方案的提出	107
第五章 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113
第一节 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政策措施	113
第二节 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主要成就和问题	132
第六章 1953~1957 年产业经济变革和发展的主要成就和主要问题	135
第一节 主要成就	135

第二节 主要问题	136
----------------	-----

第三编 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产业经济(一)

——“大跃进”阶段的产业经济 (1958~1960年)

导 言	140
第一章 “大跃进”运动	141
第一节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	141
第二节 1958年,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	143
第三节 1959年上半年,对生产建设高指标的调整	148
第四节 1959年夏,庐山会议后再次掀起“大跃进”	150
第二章 人民公社化运动	154
第一节 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兴起	154
第二节 1958年冬到1959年夏,对农村人民公社化中“左”的错误的初步纠正	156
第三节 1959年,庐山会议后农村人民公社化中的“左”倾错误再次泛滥	159
第四节 城市人民公社化的发展	160
第五节 手工业和商业合作组织的全民化	161
第三章 改进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管理制度	165
第一节 改进经济管理体制	165
第二节 改进企业管理制度	171
第四章 1958~1960年,产业经济的进展和“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及主要教训	175
第一节 1958~1960年,产业经济的进展	175
第二节 “大跃进”对产业经济造成的严重后果	176
第三节 “大跃进”的主要教训	180

第四编 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产业经济(二)

——经济调整阶段的产业经济 (1961~1965年)

导 言	188
第一章 调整经济	189
第一节 1961年,工业初步调整	189
第二节 1962年,工业全面调整的决定性阶段	190

第三节	1963~1965 年,工业继续全面调整	200
第四节	调整农业	204
第五节	调整第三产业	206
第二章	调整企业体制和整顿企业管理	208
第一节	调整农村人民公社体制	208
第二节	整顿国营工业企业	213
第三节	调整和整顿手工业集体企业	221
第四节	调整第三产业企业体制和事业政策	227
第三章	再次调整经济管理体制	230
第一节	再次集中经济管理权限	230
第二节	试办托拉斯	237
第三节	调整后期重新扩大地方和企业的管理权限	241
第四章	经济调整阶段恢复、发展产业经济的主要成就和经验	244
第一节	主要成就	244
第二节	主要经验	247

第五编 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产业经济(三)

——“文化大革命”阶段的产业经济

(1966~1976年9月)

导 言	252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支配下的经济运行的曲折进程	253
第一节 1966~1968 年,全面内乱与经济衰退	253
第二节 1969~1973 年,“三个突破”与经济调整	254
第三节 1974~1976 年,经济整顿的成效与夭折后经济增幅的急剧下滑	257
第二章 备战战略指导下的“三线”建设	261
第一节 “三线”建设的实施	261
第二节 “三线”建设的主要成就和严重后果	262
第三章 经济管理体制的再次改进与企业领导制度的变动	265
第一节 经济管理体制的再次改进	265
第二节 企业领导制度的变动	271
第四章 1966~1976 年产业经济的进展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及主要教训	273
第一节 1966~1976 年,产业经济的进展	273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对产业经济的严重破坏	277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教训	282

第六编 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产业经济(四)

——经济恢复与“洋跃进”阶段的产业经济

(1976年10月~1978年)

导 言	286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与产业经济的恢复	287
第二章 “左”的政策继续与国民经济“洋跃进”	291

第七编 市场取向改革起步阶段的产业经济

——以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

小康水平为战略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

产业经济(一)(1979~1984年)

导 言	296
第一章 经济调整	297
第一节 1979~1980年,工业的初步调整	297
第二节 1981年,工业的决定性调整	299
第三节 1982~1984年,工业的继续调整	303
第四节 农业的调整	308
第五节 第三产业的调整	311
第二章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率先突破	312
第一节 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发展过程	312
第二节 农村集体经济双层经营体制的形成和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	316
第三章 国有经济实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特征的改革和企业整顿	318
第一节 国有经济实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特征的改革	318
第二节 国有企业的整顿与企业领导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326
第四章 非国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335
第一节 城镇集体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与发展	335
第二节 乡镇集体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与发展	338
第三节 个体经济的恢复	339
第五章 市场体系的开始发展与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起步	342
第一节 市场体系的开始发展	342
第二节 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起步	343
第六章 对外开放的初步发展	347